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传统家训

——中外家训交流与互鉴（一）

□ 柯 昊

朝鲜半岛与中国隔海相望，在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中，曾经以文睦邻，互补互惠，共同促进中亚文化发展到高峰。家训文化见证了两国密切而深入的文化交流，朝鲜半岛家训起源于高丽时期（918—1392），现存高丽时期的家训有徐棣的《居家十训》和申贤的《家范》。在之后的李氏朝鲜时期（1392—1896），随着儒学成为官学，尤其是官方儒学教育机构均馆建立，家训文化蓬勃发展，成为家训编撰最为活跃和数量最多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家训均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大学》和《朱子家礼》成为家训文化形成的内在价值观和外在礼仪规范。在当时最为著名的家训代表作中，四书五经、理学家张载、周敦颐、朱熹、二程的著述均频繁被引用，儒学家国同构和修齐治平的思想成为其中的文化价值内核。

深受宋明理学影响

朝鲜半岛家训自产生时就受到北宋理学的影响，对理学义理把握精微，注重以理学思想构建家训的理论框架，以天、地、人的产生为起点，糅和气本论、太极说、天理等来论述家训的社会文化基础。极具代表性的是高丽末期申贤所撰《家范》，申贤大致生活在恭惠王在位时期（1351—1374），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家范》完整阐述了家训文化的理论背景，大篇幅使用儒家经典原文建构家训的产生基础。申贤以《易经》阴阳二元论为前提，以气理之说为基础，指出太极分阴阳、太虚清浊升降运动，致使万物动静变化，引申至人之生生，以至人事也必定有行有止。太极运行和宇宙万物动静变化之理即是德性、天理，人的行为、社会的运行都必须合乎“理”，这就是家训建立的理论基础。因此，家训一方面是《中庸》里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遵天理而施教化；另一方面则是《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有具体实践途径。在此基础上，人们确立了行为规

范，齐家则有家范，由家至国，则是治国国有法。

以《大学》修齐治平为根本

朝鲜半岛的家训在15世纪逐渐有更明确的目的和功能，体例也更为严谨规范。这一时期的家训大致可以分为修身、齐家和处世三个部分，根源于《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当时的家训名作《东湖集·家训》《桂岩家训》《会峡家训》等，虽分章略有不同，但内容基本围绕三纲八目展开。“修身”主要是存心养性以“明德”，首要应该勤读好学，认为学习儒家经典是传家的根本。家训中多列有书目，一般以四书为根本，兼及性理诸书，旁及诗史子赋，要求子孙多读益书，学习有方。家训要求家长以身作则，用礼来培养家族成员的行为习惯，在举止、饮食、服饰、起居等方面提出详尽的规范要求。“齐家”汲取《大学》“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思想，认为家庭是治理国家的最小单位，家族集团内部规范体系的家礼与国家规范体系互相影响。齐家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包括孝亲、教子、和夫妇、友兄弟、信朋友、睦宗族。《愚谷先生训子格言》用程子之言论“齐家之道”，说“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正伦理使家族秩序井然，尊卑分明；笃恩义则长幼有序，仁爱和睦。“治平”主要有事君、仕宦、接人、待宾、交游、睦邻、恤穷困。朝鲜半岛家训汲取了《大学》中的“家国同构”思想，认为“治国之道如治家，治家之道如治国。虽有大小之殊，其理则一”。首先体现在“忠孝一体”观念中，认为侍父以孝，可以类比于以忠侍君，“家之孝即国之忠”。其次认为家事与政事具有同一性。范立本在其《治家节要》中说：“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

妻子，处官事如家事。”最后认为治家品格要运用到仕宦和职事中，《眉岩集·庭训》中说，“凡从仕任职，宜勤谨不怠”，在共事中要“敬事上官，和睦同僚，不言同僚之短于人”。

源自《朱子家礼》的日常规范

朝鲜半岛的古代家训文化包含有丰富细致的日常行为礼仪，这取材于《朱子家礼》。朝鲜王朝能够持续长达500余年，与其基层社会、家庭稳定有最直接的关系，而朱熹《家礼》在当时的广泛推行导致乡风民俗儒化，起到了维持民间社会秩序的作用。李氏王朝时期，朱熹《家礼》被运用到家训中，与当地民俗相结合，形成士大夫家庭中日常行为礼仪和规范。同时，又由士大夫阶层在乡里表率和推广，逐渐为基层社会接受，发展成整个国家的社会规范和民族文化核心。朝鲜古代家训多有运用家礼制定家庭一天的行为处事，比如《果斋集·家训》从晨起未明到夜晚家庭成员的居家事宜都做了相应安排。一般晨起要洒扫阶庭，日出前家中晚辈要向长辈问安，家长率长辈拜谒家庙，婢仆打扫堂室，入学子弟诵读洒扫，日间各赴其职，内外有别。晚上家长思考安排次日事务，婢仆夜作，子弟夜读，长男查夜。朝鲜时代的家族是累世同居共财，家族聚居成为村落，家训自然发展成为乡规民约。此外，北宋时期著名的乡规民约也被朝鲜半岛运用于乡村自治中，《后松斋先生家诫》提到吕氏四兄弟以及“吕氏乡约”，认为乡约制定应遵守“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朱子家礼》对家训的影响，使朝鲜李氏王朝保持了当时基层社会、家庭的稳定，美化了乡风民俗，维持了长时间的统治。

朝鲜半岛家训的特点

由于地缘关系，朝鲜半岛是世界上传入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时间最

早、传播领域最广的地区，因而也是受到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朝鲜半岛家训虽然继承了中国家训的形式和内容，但融入了东北亚特有的文化要素，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

一是“忠义诚信”的高度民族化。朝鲜半岛家训将儒家仁义、忠诚、谦让、中道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历代家训均强调忠义诚信是家庭成员应该学习和实践的基本道德品质，也是人安身立业的基础。忠义诚信观念通过家训成为深入人心的价值观，上升为民族的精神品格，强调个体价值实现与对民族、社会、国家的贡献同一化，因此朝鲜文化中有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忠诚、牺牲、忧患、不息精神。二是“礼义纲纪”的切实制度化。朝鲜半岛家训一方面重视讲清楚训诫的道理，另一方面则尤其重视笃行践实，即“礼义纲纪”的制度和规范化。在详细研究《朱子家礼》《礼记》等礼仪文献的基础上，将其中的礼节仪式落实到百姓家庭寻常日用规范之中。除此之外在古代社会治理中积极进行制度化探索，在朝鲜士大夫家族中落实，形成社会表率；在乡里民间建立乡规、乡约、乡礼、乡约。

三是“博采务实”的创新实践化。在19世纪之前主要吸收东亚地区先进的儒家文化，在19至20世纪则转而将西方文化融入家训文化主体中。如吴相奎家训强调工业、商业、医学等新行业的重要性，将其与传统农业并重。他在《槐庭集》中指出：“国富之策在于工业也，须学技术，先国家之利而后其家，则是吾所以大愿也。”同时他认为外交、医学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外交“交邻国有道”，既保护了国家权益，又遵守条约，以德服人；从医者“欲学其医，则须学东西医学，专门而并用于内外科，以济众生可也”。



公元前202年，历四年之久的楚汉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诸侯们在定陶推举汉王刘邦为皇帝。打下江山的统治集团，首先面临的议题是论功行赏排座次，但因评定的标准不好把握，很难一碗水端平，发生争端在所难免。朝廷上下没了规矩和秩序，如何能够顺利摆平？

儒家出身的叔孙通，对刘邦的心病了然于胸，于是站出来，那些儒生很难帮您攻城略地，可是却能帮您守成天下。臣愿征召鲁地的儒生，跟我的弟子们一起将古礼与秦仪杂糅起来，制定新的礼仪。刘邦说，可以尝试操办一下，但要简便易行。

于是，叔孙通就召集了百余人，操练了个把月。刘邦视察后让他们行礼示范，然后说，我能做得到，就令群臣都来练习吧。待到刘邦迁往长乐宫后，百官依次拜贺，场面肃敬，秩序井然，汉礼就此成型，并逐渐修订成典仪，相沿传诸后世。叔孙通牛刀小试，不仅拉开了汉朝典章礼仪建设的序幕，也让刘邦体验到，打天下与坐江山毕竟不完全是一码事，规章制度建设理所当地提上了议事议程。

楚人陆贾，口才极佳，以幕宾的身份随从刘邦平天下，常常出使诸侯各国，曾说服南越王赵佗归汉，被刘邦封为太中大夫。接下来，陆贾又以商汤、周武和夫差、智伯、嬴政的经验教训为例，说明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方为长治久安之策。刘邦听后，虽说不快，但脸有赧色，就对陆贾说，那您就尝试着把秦亡我兴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原因总结出来。这样，陆贾就国家存亡之道简略地写出了12篇论文，每篇上奏时，皇上无不称道，左右群臣也齐呼万岁，称这部书为“新语”。

如果说，陆贾提出的“新语”，还只是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叔孙通完善的只是一些礼仪法规，那么，萧何的贡献在于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制定了基本律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九章律》，又称《汉律九章》。

早在刘邦率先进入关中时，萧何就直奔秦宫，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这为日后制定法规律令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诘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就是说，萧何在汉初“约法三章”基础上，取秦法六律，合为九律。前六篇大致与秦律相同，出自李悝所著的《法经》，后三篇新增了关于户籍、婚姻、赋徭、畜牧等方面的规定。唐



□ 王兆贵

初，在李世民亲自过问下，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主持编修的《晋书·刑法志》，对汉书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九章律》是萧何以李悝的《法经》六篇为基础，增加了户律、兴律、厯律三篇，合为九篇，即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和厯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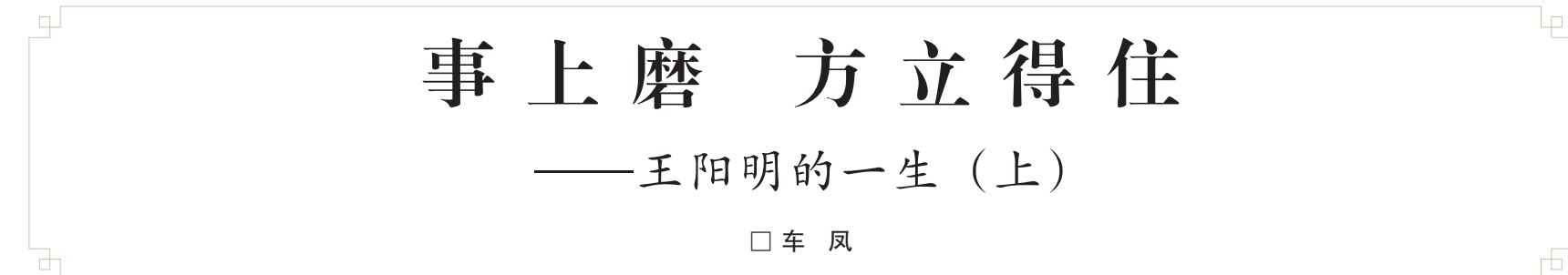
这套基本政治制度，经过不断增补，到萧何逝前，已经趋于完善。按照通行说法，两汉以《九章律》为主要法典，相继建立了一些辅助性法规制度，也以“律”命名，包括叔孙通的《傍章》18篇，张汤的《越官律》27篇，赵禹的《朝律》6篇，共60篇。《九章律》的颁布拥有重要意义，汉以后的历代法律大多以《汉律》为蓝本，它被誉为律令之宗，“百代不易之道”。近代思想家、教育家严复曾经说：“三代以还，汉律最具。吾国之有汉律，犹欧洲之有罗马律也。”



王阳明的一生，证成了“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气象万千、光耀千古。他一生三次证道，36岁时贵州龙场悟道“心即理”，48岁时南昌悟道“致良知”，55岁时余姚天泉证道“四句教”，最终形成了其哲学思想的完整体系。这一切皆是建立在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基础上的。他的一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息息相关。

“不第非耻”追求圣贤境界的青少年时代

王阳明知止而后有定，自少年立志，便确定了一生的努力方向。《王阳明年谱》记载，他出生于1472年，13岁时，母亲郑氏去世，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有一次，他与私塾先生探讨“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说：“第一等事就是读书登第，像你父亲那样。”王阳明直言不讳地说：“先生，恐怕不是的，我觉得第一等事乃读书做圣贤。”自此之后，他穷尽一生去探求追问、躬身修行实践，最终成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经天纬地之才。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在王阳明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1486年，15岁的王阳明出居庸三关，考察边患、察看地形、谋划防务，跟北方少数民族学习骑马射箭，刻苦勤练，箭术一流，可以做到“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他凭吊古战场，缅怀先辈于谦，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失踪”一个多月后他风尘仆仆回到家里，腰间佩剑，一副仗剑天涯的侠客模样。1487年，鄂豫陕交界地区发生流民暴动，建国号为“汉”，震动京师。16岁的王阳明觉得这是自己为国效力、显露身手的机会，他写了一份长篇奏折，结合他的兵法知识和考察



——王阳明的一生（上）

□ 车 凤

经验，审势谋策，请缨带兵去征讨。他托父亲把奏折转呈皇上，父亲痛斥他为“狂生”。

事实上，孔夫子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王阳明之所以对“武备”如此重视，在于他坚定地认为：儒者如只会读圣贤书而不会用兵，那无疑是一种耻辱。他看到历史上有太多以文章词句欺世盗名、粉饰太平的儒者，一旦遇到社会危机、国家变故，真真就剩下了束手无策、百无一用。

王阳明天生活泼好动，自小是个调皮捣怪、率真淘气的人。20岁的时候，为“备战”科举，他日夜读书，沉浸于经史子集中，经常废寝忘食。有一天，周围的人突然发现王阳明的气质变化了，变得正襟危坐、谨言慎行，这种与过去的反差让有些人觉得好笑，王阳明正色回敬道：“我过去放任不羁，如今知道自己错了。春秋时期卫国的蘧瑗最后活到50岁，他是到了49岁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现在刚刚20岁，悔过自新还不晚吧。”圣贤书让王阳明脱胎换骨，21岁时他在杭州中举浙江乡试。然而，22岁时他却在京师会试中落榜了，这还不算，三年之后的科举考试中，王阳明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他坚定豪迈地笑笑，回应可谓语出惊人：“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孟子夫子曾说，“吾四十不动心”，意为40岁便不会再让心被外物得失绑

架，而王阳明则是在25岁就显示了如此的气概。儒家之学，在王阳明看来分为举子学和身心学两类。学习之目的在于科举进而升官发财的，无疑就是举子学。而读圣贤书旨在修养身心、自我完善进而治国平天下者，乃是真正的身心学。站在身心学的立场上，当然就会认为“不第非耻”，而一旦一个人因为不第而影响了自己如如不动的内心，就说明其距君子气象还差得很远，是应当自以为耻的。

回归儒学并与奸佞正面冲突的中年时代

与人们想象中的圣贤不同，王阳明除了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更以一位终生未有败绩的军事家的形象永载史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无疑也称得上是一位最会打仗的读书人。青年时期的王阳明，因文才过人，一度驰骋文坛，1494年，23岁的他回到浙江余姚组织龙泉诗社。彼时，他在京师皇城和家乡绍兴都拥有词章盛名，与当时的诗坛领袖以文会友，意气风发，所谓“泛滥辞章一时柳”，然而，他很快觉得“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于是，他毅然决然退出文坛，再转去研习兵法，得高士许璋真传，重燃经略四方之志。

事实上，32岁之前的王阳明，因为各种机缘，曾深入学习过道家 and 佛

家。他于各处求仙访道，修炼道家养生仙术，亦常参禅静坐修炼佛家空性。他厌弃世之纷扰，曾经决意出家，但顾念祖母和父亲，觉得子孙当尽孝养之道、赡养之责，此乃人之基本道义，几经思想斗争，最终弃佛回儒，“正德丙寅年元年，始归正圣贤之学”。

王阳明之所以创建心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正是针对明王朝令人失望的皇帝、官员及大众的道德沦丧而来。明代中叶之后，中西方海运航线开辟，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塑。大众物欲膨胀、人心不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功利主义倾向弥漫的社会，正是孔子曾忧心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视国家社稷如儿戏，又有太监专权，宵人取胜，权倾万乘，威劫大臣；官员唯唯诺诺，阴谋者胜，阳谋者败；苛捐杂税极酷，国法恣睢，激变民心；明王朝天下之势，每况愈下。这些都让王阳明痛苦而无奈。

34岁的王阳明此时开始开门授徒，并与湛若水成为志同道合的密友，共倡圣学。朱厚照即位后，带来了急转直下的政治局势。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负责监察和谏言的“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忠肝义胆坚持上书皇帝，要求严惩刘瑾等权奸，端正国法，却反遭执

王阳明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病情更重的随从，还努力调动生活气氛和心情，带给他们精神的支撑和抚慰。

这样度过一段适应期后，粮食快要吃完了，王阳明就“刀耕火种”烧山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耕种粮食。他还教当地人打土坯、用木头盖房子，教化引导民众，受到百姓爱戴。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功名富贵都变得十分虚幻缥缈，一切荣辱得失似乎也都没有了意义，为什么要活着和如何活下去成了唯一需要思考的命题。在此期间王阳明写下《瘞旅文》，总结“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意识到，以往到事物中去求理的方法和途径是错的，理不在心的外面。圣人之道，理本来就具足于人心。这样的一种体悟，史称龙场悟道。

孟子夫子说“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马一浮先生说“学问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一个人学道，不是知道些名词、概念、道理就成为圣贤的，如同今人调侃的“我们都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知晓“心即理”三个字，和切切实实在自己的心中体验、体悟、体证到天理的存在，进而把此理扩充到全部生活实践，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几十年圣学之路苦苦探寻的一朝破茧，是他看破得失、超脱荣辱、参透生死后的豁然贯通。

37岁龙场悟道

经父亲的周旋请托，几个月后，朝廷裁决王阳明出狱，谪贬至贵州龙场做驿栈驿丞。王阳明从京城回浙江老家做赴谪准备，刘瑾派出的锦衣卫一路尾随追杀至钱塘江边。王阳明制造跳江的假象，江边遗下衣服鞋子和绝命诗，蒙过锦衣卫，得以逃脱追杀。绝命诗有云：“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等他暗中找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父亲对他讲：“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1508年春天，37岁的王阳明终于到达尚未开化的贵州龙场，目之所及“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王阳明和三个随从，因水土不服、生活条件艰苦，全部病倒。

